

一百年来,这一场民族资本主义革命曾经被无数人评价,但是真正的民族资本家们的命运,却少人探寻,这或许正是那一场惊天动地、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革命的另外一个注脚。

中国企业在 1911

■ 别水

100年前,那一场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大事件,开启的不仅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,同时也是中国商业的分水岭。

然而,在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中,那些真正的资产阶级商人和他们的企业处境如何,却少有人提及。当史学家们反复地争论革命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时候,他们的命运往往被人忽略。这些名义上的革命主角们,很多都被蒙上了历史角落里的灰尘。

民间与官方的大对决

当整个世界逐渐连为一体的时候,先行者不是政治、军队、甚至不是诈骗与掠夺的殖民者,而是商业,尽管这种商业往往并非平等的交换与交流,但不可否认的是,近代工业化大机器生产的产品,总是敲开那些古老而封闭的地域的第一块砖,家庭作坊式的小手工业产品在它们面前毫无还手之力。而那些横跨世界的大企业,也总是最先和最终得利的。政治和军事的交锋往往是一时的,而商业的往来却绵延不绝。

在工业化最后的时间里,中国显然没有跟上整个世界的脚步,所以只能被动地等待世界走到中国人的面前,而不是中国走到世界面前。所以,当整个世界汹涌而来的时候,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,从一开始,走的就是另外一条路。

这条路是自上到下的被迫而行,中国最初的企业,并非出自资本家之手,而是出自官吏之手。自洋务运动开始,开眼看世界的朝廷要员和封疆大吏们看到了资本对整个世界的改变,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资本究竟应该在谁的手里才会真正发挥作用。或者,他们并非没有意识到,只是拒绝去想而已。

中国的商人对于官,对于政治,从来都是敬而远之的,这和数千年农业社会的组织结构有关。然而,到了近代资本主义来临的时候,商和官却联系得太紧密了,甚至商成了官的从属。不管是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张之洞等一干洋务大臣,还是胡雪岩、张謇,无不和官有分不开的关系。

洋务运动以来,中国企业无非三种形式,官办、官商合办,官督商办。两千年前,《大学》里说:“千乘之国,不畜聚敛之臣”,然而两千年后的洋务时代,“聚敛之臣”成了救亡图存的唯一希望,但这希望并不那么美好,因为它不但考验着那个日薄西山的政府的支付能力,也开启了官与民争利的大时代。

这是两个无法解决的矛盾。不管是李鸿章办的轮船招商局,还是张之洞办的汉阳铁厂,抑或是其他官办企业,赢利的时间都不多,反而是迅速在政府和官僚的盘剥之中人,不敷出,特别是到了辛亥前夜的盛宣怀时代,此时的轮船招商局四处投资,却无法赢利,汉阳铁厂同样处境尴尬,高投入换来的是低产出,产值远远比不上投资,这也是整个清末大企业的共同尴尬。

而另一方面,官方企业和民间资本的争利也愈加激烈,盛宣怀的铁路国有化主张彻底激怒了国民之间的矛盾,辛亥前夜,民间资本投资铁路成为风潮,不管是官员富商,还是农民工匠,“莫不争先入股”。然而盛

宣怀的国有化却将这些投资者陷入绝境,清政府将所有股份收归国有,却不肯补偿原本入股者,终于引发了中国政治体制大变革之前最著名的运动——保路运动。也正是这一运动,成为帝国覆灭的前兆。

投机还是投资

轮船招商局疯狂扩张,却都无法赢利,汉阳铁厂入不敷出,开平矿务局正陷入国际纠纷难以脱身,铁路股变成火药桶……当年郑观应“开矿、造船、修铁路”的实业救国梦想几乎全部陷入困境,不管是官办、还是官商合办,抑或是官督商办的企业,几乎全都问题重重,却无力扭转乾坤。

相对于实业,代表虚拟经济的金融业则陷入了泡沫膨胀的危局。辛亥前夜的中国投资领域,买股票,投资金融正成为人们最火热的话题。

1911年3月,第一版中央印制钞票降旨批准开印,然而,还没有来得及流通,就胎死腹中。与此同时,疯狂的金融泡沫正在破裂。3月下旬,义善源票号受累于股灾,以负债1400万两宣告清理。义善源是李鸿章的亲兄弟李翰章江苏洞庭山富商合伙经营的,资本雄厚,背景深不可测。然而,它的破产,仅仅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,危机如野火燎原,内城永顺、永祥、北德胜等十六家钱庄相继关门停业。全国上下,百余家钱庄票号倒闭,甚至也包括上海最“牛”钱庄,宁波巨商严信厚、严义彬父子缔造的源丰润。数万中小股民,百万两资金被套。不管是晋商,还是徽商,无不在泡沫的破灭中粉身碎骨。

所有的灾难,其实都早有征兆。1910年3月中旬,一家名不见经传的英国橡胶业公司伦敦股市融资失败后,却在中国受到了狂热追捧:股票发行时间原定上午10时,但排队者人山人海。一个小时内,股票申购完成,价值10万两的股票吸纳了160万两的认购资金。上海商人陈逸卿、陆达生和唐寿江等人广泛利用中外金融圈的人脉,调动钱庄钱款,向外资银行拆借,大量买入橡胶股票。在他们影响下,上海三十余家钱庄大量购存股票。如森源钱庄,自有资本不过一万两,也多方筹集20万两参与投机。

中国人对金钱的激情和投机的精神刺激了列强的欲望。资料显示,股灾爆发前,华商投入上海橡胶股票交易金额约为2600万至3000万两;投入伦敦市场1400万两。投资总额在4000万到4500万两左右,将近清王朝的一半收入。

泡沫总有破裂的时候,股灾如期而至,1910年3月,上海市场每十股橡胶股票售价白银70两。而在1911年3月,每10股橡胶股票售价仅为白银7两。各个金融大鳄、钱庄巨擘相继倒下,当时报纸评论称:“财界扰乱已达其极,一般社会咸被其灾,全国乃宣告破产矣。”

革命的枪声响了

革命的枪声终于打响了。从当年汉阳铁厂的地方开始,虽然这直接导致了汉阳铁厂停业,但对于商人们来说,这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事情,革命给他们带来的,是希望和新生,因此,无数的实业家们疏财仗义,甚至毁家纾难,在所不惜。比如



张謇。

张謇,这个晚清最著名的状元企业家,在革命的烽火中依旧站在时代的最前潮。张謇自1911年12月一个多月间,为中华民国开国共筹军政费用50万到70万元,他还直接参加了有关行动,南通地区的光复,即由张参与操控。江苏省临时议会上,张謇亦当选为省临时议会议长。

不仅仅是张謇,一大批企业家们都把革命当做了新生的希望,沈缦云以信成银行行长名义出具一万两银子的保单,并与胞弟所在洋行德籍总经理密约,代同盟会购买价值一万银两的武器。沈还受孙中山先生委托亲往南洋群岛,宣传革命主张劝募捐款。公开资料显示,在1894年到1911年的华侨资助的款额,占革命派全部经费来源的75%左右,其他来源如革命党人会费、外国友人捐款、港澳台同胞捐款,占15%左右。

1911年到1912年的一位湖北地区商会会长,曾在革命中筹办餉糈,并慷慨捐输。商人们输出的不仅仅是金钱,还有精力、理想、希望,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让企业家们以为自己的时代已经来临,他们改变几千年疏远政治的态度,亲身走上政治的第一线,杭州新军起义成功后,实业家汤寿潜被陈其美和上海商人推荐为浙江都督的人选。在立宪改良时曾经营医院、水厂、大学的李平书,一度全面管理了上海的地方行政事务……

当然,革命也为无数的生意人们带来了契机,最典型的无疑是南洋兄弟,南洋兄弟最早创办于1905年,最初名字叫广东南洋烟草公司,3年后亏本歇业,1909年再起东山,改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,华侨爱国心大受鼓舞,国货畅销。兄弟二人抓住时机,致力于推广中国货,新产品畅销华南及南洋各地。

得利的当然不仅仅是南洋兄弟,无数大大小小的商人们在革命中闻到了金钱的味道。上海朱锦堂号在临时政府成立后印“新国民必用品”——彩色新祥纪念邮票。杭州一商家精选洁白杭纺手帕,精印孙中山和他两个女儿肖像,生产共和

革命的枪声终于打响了,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希望和新生。因此,无数的实业家们疏财仗义,甚至毁家纾难,在所不惜。

纪念帕,宣称:“纪念帕颜色鲜明,落水不褪,与洋货纱巾比较精致经久,军界买来可作纪念品,学界可作奖品,女界可作赠送品。”旧式的朝靴、腰带被淘汰出局,皮包、手杖等物件成为市民新宠。

革命的另外一面

然而,一切并非想象的那么好,资本家们毁家纾难,慷慨解囊,支持革命,但是这场号称资本主义革命的事业并没有平等地对待资本家们。革命的主张里,也并没有为资本家们维护利益的内容。

实际上,现实恰好相反,那位为革命捐款的湖北商会会长,并没有在革命成功后获得回报,反而“身负巨亏,束手无策,其税铺因负累甚巨,以致沦落到了求售各处房产以向新政府偿还巨额债务的境地。”

另一位银行业人士,曾任上海大清银行经理的宋汉章,革命后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,曾在上海新市长陈其美邀请下,前往赴宴,席间陈其美提到筹餉,宋汉章婉拒,反而引来陈其美的绑架,并且关押两周之久,才在多方努力之下获释。

孙中山一派的革命党人,一直都面临极为紧张的财政局面,革命筹款因之不断追加,各种税务也越来越重。而且,孙中山所设想的最终社会模式,实质类似于国家资本主义,他起草的国民党一次宣言中即提出“节制资本”,要求在银行、铁路、航路等领域,由国家经营管理。这恐怕并非是那些慷慨解囊的企业家们所希望的结果。

事实确如此,革命之后短短的一两年之间,全国的企业家们和商会迅速转变了立场,在1913年7月讨伐袁世凯的“二次革命”之时,在上海总商会,就支持革命党讨伐袁世凯的议案,二十余人中只有沈缦云等四人举手赞成。即便是张謇,也转而支持袁世凯。

辛亥革命之后,几十年的军阀战争之中,企业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——和军阀结合,这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,也或许是乱世下的无奈。中国的资产阶级,从先天不足,终于走向了“后天畸形”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孙中山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实获得了成功,不管是在实业中,还是在金融中,其实都有迹象可循。比如汉阳铁厂,1912年,汉阳铁厂恢复生产,一战期间曾经一度辉煌,但战后随即衰落。1921年民国政府(北京)改变钢轨标准,造成汉冶萍公司近5万吨钢轨无销路,汉阳铁厂炼钢全部停产,1927年到1937年,由汉阳铁厂、大冶铁厂、萍乡煤矿组成的汉冶萍公司逐渐被国民党政府接管,最终在抗战后被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收,汉阳铁厂历史也宣告结束。而在金融界,以大清银行为典型,辛亥后改为中央银行,同样是国家资本主义下的牺牲品,在国民党当政期间,中央银行的斑斑劣迹也不用多说。

一百年来,这一场民族资本主义革命曾经被无数人评价,但是真正的民族资本家们的命运,却少人探寻,这或许正是那一场惊天动地的,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革命的另外一个注脚。

思想



中国现代社会起点以及华商崛起元年

■ 晋铂

2011年10月10日,是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纪念日。

说其伟大,是因为它不仅推翻了清朝267年的封建统治,终结了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史,使我国进入了民主共和新时代;同时,在经济上,它直接孕育了一个新的阶层——企业家阶层,使我国开始结束小农经济进入了近代工业化的新时代。

可以说,辛亥革命是我国民族企业家崛起的元年。辛亥革命前后,我国出现过三类企业家,他们特征各异,作用不同,有合作也有斗争,对社会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这三类企业家的代表分别是“官商之父”盛宣怀、“士商(绅商)之父”张謇和“民商之父”荣氏兄弟(也有人将士商归入民商一类)。

盛宣怀“一手官印,一手算盘,亦官亦商,左右逢源”。他终生奔波,为清廷建设和经营了大量企业。这些企业中,朝廷要控股或独资,产权要“国有”,运营要官府(行政)化。企业如衙门,经营者如官员。

张謇出身状元,却认为“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”,毅然“舍身喂虎”下海自办企业。创业之中,他坚持将官府体制阻碍于企业经营之外,确保了企业经营的“市场纯洁性”。同时,作为优秀儒家知识分子,他坚信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,将企业取名为“大生”。他坚持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志向,勤俭节约,回报社会,将他的家乡南通建设成“中国大地上的天堂”、“中国最先进的城市”、“理想的文化城市”和“新世界”。

荣氏兄弟则是地地道道的民营企业家,他们创办面粉厂、纺织厂和其他产业,出发点都是民生,融资和经营完全是依靠自身的力量。他们本系草根,同情大众,对以后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贡献颇多。

从企业史的角度看,辛亥革命就是民商对官商的斗争。在官商盛宣怀镇压保路运动的时候,民商张謇在长江上看到了武昌起义的火光;在官商盛宣怀被清廷定为“误国首恶”的时候,民商张謇则成了中华民国政府实业总长。其后,张謇又参与起草了宣统皇帝的《退位诏书》,给入殓前的清王朝盖上了最后一块“遮羞布”。

我国企业家的成长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,即清末的萌芽时期、辛亥革命的发展时期、1956年后的沉寂期和1978年后的快速发展期。

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,辛亥革命的作用是承前启后的,影响是巨大的。它直接推动和极大地激发了人民大众投身实业的热情,涌现出大量的民营企业家,不仅在1911年—1927年出现了我国民族企业发展的“黄金时代”,而且其后华商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崛起,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。

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,企业家在大陆“沉寂”,但在港澳、台湾和海外地区依然强劲。特别应该指出的是,正是辛亥革命时期培育出的企业家及其后代们,如荣氏家族等,凭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,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巨大的经济实力,为我们打开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扇窗口,使我们迈开了引进外资、建设特区的第一步。

如今,企业家队伍特别是民营企业队伍迅猛发展,已然成为改革开放的显著标志。去年我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,企业家功不可没。

然而,辛亥革命不是一场彻底的革命,没有彻底地完成反封建的任务。封建余毒依然弥漫,渗透于企业家的血液之中,其最典型的表现是企业官员化。孙中山本身就是个主张铁路国有的官商主义者,大量企业家革命后也任职于政府部门转化为官员。国民党统治时期,企业家更是官僚化,以至于官僚资本家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对象之一。

即使一些民营企业家,他们也是要千方百计地在政府部门弄个官衔——哪怕只是个空衔虚职!这与企业家参政议政完全是两回事。

清末时期,企业家没有独立起来,总是靠官府和官员的“保护”,辛亥革命仍然没有做到这一点。企业家与官府的组合,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劳资对立、工企对立、官民对立,极易激化社会矛盾。另外,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层面上,也存在着与民营企业家的对立。他们不能站在平等的市场竞争平台上,更是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。

在这种背景下,国有企业的效率远远低于民营企业,国有资本的瓦解确乎是一种铁律,官商的命运也令人唏嘘。盛宣怀是清廷覆灭的“误国首恶”,四大家族是国民党政权覆灭的罪魁祸首。100年前,盛宣怀由于修铁路而使清廷覆灭。不知道其中谁会是“误国首恶”之后的“二恶”、“三恶”以至无穷?

中国要发展,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不断壮大的企业家队伍是必然要求。它是一股巨大的历史洪流,浩浩荡荡。

胡锦涛在2011年10月9日举行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:“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。”“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、最亲密的合作者、最忠实的继承者,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。”

辛亥革命以来,我们的民族企业家队伍崛起了,发展了。但时至今日,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。

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须当努力!”。只要我们坚持“以人为本”,发扬先驱们“以民为本”的革命理想,只要我们把先驱的话记于心、践于行,中国的企业家队伍一定会蓬勃发展,也一定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!



江南造船厂原貌